

# 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会职能及其有限性的理论阐释\*

刘 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91)

**【摘 要】**工会职能观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解现代工会组织政治形态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维度。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会职能及其有限性的理论阐释是在领导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展理论批判的过程中推进的。他们肯定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工资利益、开展政治动员、提供社会救济、灌输阶级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处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工会很可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绥靖政策”所吞噬,甚至会走向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苗头和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强有力领导来保障工会组织的纯洁性和进步性,这一重要原则是中国工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论渊源和思想源头。

**【关键词】**工会职能;利益维护;政治动员;社会救济;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D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75(2025)01-0034-11

中国工会是世界上人数规模最大的职工群众组织,工会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力量。实现中国工会从“大”到“强”的跃升,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着力构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历史根基、理论渊源、政治属性、制度形态以及比较优势的中国工会自主知识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职能及其有限性的理论阐释是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构建当代中国工会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滋养。所谓“职能”是指由事物的本质规定性所展现出来的积极影响和功能作用,组织性质决定组织职能,组织行为是对组织职能的现实展开和实践形态,韦伯把“组织职能”定义为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所采取的理性的经济行动,以期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对工会职能的形成逻辑、拓展空间、职能运转及其限度性等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下对工会职能展开深刻的历史分析,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职能的基本思想,赋予其科学性的理论品格和革命性的实践品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职能的基本思想,把握工会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有限性,对于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工会学说的原创性贡献、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工会改革再出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一、工会经济职能:保卫工人工资利益及其有限性

工人阶级为维护 and 实现自身阶级利益而组建工会,工会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和

\* [收稿日期] 2024-11-1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支持计划项目“《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社会历史性阐释研究”(项目编号:KG162661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佳(1989—),男,辽宁抚顺人,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原理、中国共产党群团组织与群众工作。

实现者。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利益是工会组织的存在价值和根本依据。恩格斯认为，“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势必在精神上死气沉沉，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sup>[2]436</sup>。只有工人阶级同雇主相分离，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工人，并且“仅仅由于金钱利润”<sup>[2]436</sup>才同雇主发生联系的时候，工人阶级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由众多利益范畴和利益关系共同构成的一个复合结构，具体包括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对工人阶级来说最为重要，其他利益类型都是由经济利益所派生的，工人阶级对经济利益最为敏感、最为看重。经济利益本质上就是物质利益。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只有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得工资性收入，从而维系个体的生命存在、日常生活和人口繁衍。因此，工人阶级要想维系自己和家庭的基本生存，就“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sup>[2]119</sup>。推动工资率的提高以及确保工资收入的稳定性，对每一个工人个体乃至整个工人阶级来说都极具根本性意义，“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sup>[2]531</sup>以维护工人工资权益为中轴的经济职能，必然成为工会的基本职能。

工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范畴，工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用以研究工人运动和工会职能的理论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对工资问题的认识，伴随他们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的分析而不断深化。马克思认为工资实质上就是工人劳动力的价格，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斗争的结果，资本家对工资率、工资额具有决定权，“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sup>[2]115</sup>。工人的最低工资就是维系工人不致死亡的生活费用，即“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sup>[2]122</sup>。《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对工资问题的认识走向成熟：一是创立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第一次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二是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本质区别，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本质，分析了计件工资与计时工资、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差别；三是阐明了工资运动的基本规律，即工资的变动受资本积累、人口自然增长以及阶级斗争等因素共同影响。

马克思对工资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他对工会职能的判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工资水平深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市场价格机制决定工资水平，“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这些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脱离这种使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倾向于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sup>[2]116</sup>。1853—1856年，受克里米亚战争的波及，欧洲国家物价持续走高，经济危机的阴霾笼罩在工商业繁荣的表象之上，工人工资水平持续下滑，柏林和博尔顿等地的纺纱工人、北明翰的制钉工人、乌尔为汉普顿的木工“结成团体，声言罢工”<sup>[3]376</sup>。他们在罢工运动中提出增加工资的口号，要求把工资提高至比“日用必需品”价格多一点的水平。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普遍要求使马克思认识到，雇佣劳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并不完全受控于“永恒的供求规律”，工人阶级亦可以集体行动（如罢工运动）的方式改善既有的工资水平，“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sup>[4]40</sup>。工人为增加工资而采取的罢工行动充分说明，“按照供求规律，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企业主们钻了工人们不熟悉劳动市场状况的空子罢了”<sup>[3]377</sup>。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水平并不一定总是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sup>[2]116</sup>，即并非总是等于工人用以维系自己基本生存的最低限度，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斗争所取得的，工会的组织价值在工人阶级为维护工资利益的斗争中得到确认和诠释<sup>[5]</sup>，“在罢工过程中争得的新的组织——工联，对他们将有重大的意义”<sup>[3]378</sup>。

维护工资在工会职能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首先，工会作为工人阶级集体身份的代表者同资本家阶级进行谈判，规定不同职业的工资标准，确保工资标准适当提高。工会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

“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照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sup>[2]451</sup>。一旦工会与资本家阶级在工资标准问题上达成一致，资本家阶级就必须严格遵守这一标准。如果工厂主拒绝按照谈判达成的标准支付工资，工会将派代表团同工厂主会面，或者送达一份请愿书；如果工厂主仍无动于衷，工会就会下令工人罢工。这被视作工会斗争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sup>[2]452</sup>。其次，工会尽可能维护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平衡，使工资保持在较高水平。为此，工会通常采取两种策略：一是对学徒制加以限制，确保资本家对工人的旺盛需求；二是阻止工厂主采用新技术和新工具，避免工资水平降低，工会“能够把他们的雇主竞相降低工资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制”<sup>[2]458</sup>。最后，工会旨在维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因此申请加入工会对工人阶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工会能够整合工人阶级力量，消灭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和分裂，“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sup>[2]454</sup>。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受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复杂性结构、资本主义国家强大力量的干预以及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工会在维护工人阶级工资利益方面的作用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工会在铁的规律面前无能为力，“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sup>[2]452</sup>，工会只能在短时期、局部地维护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工会难以改变工人绝对贫困的事实，“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sup>[6]410</sup>。究其原因，这与工会斗争目标的短期性、不彻底性不无关系，“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sup>[7]78</sup>。

马克思恩格斯还对造成工会经济职能有限性的复杂因素进行了分析。一是工人阶级对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判断。恩格斯发现，有些工人没有加入工会，还有一些工人为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退出工会，资本家阶级将利用这些游离于工会组织以外的工人来制造工人阶级的分裂，“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sup>[2]452</sup>。二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工会力量的削弱。由于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法庭是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如果有人向法庭控告工会会员，工会将在法庭中处于被动和劣势地位，工会力量要受到资产阶级法庭的削减和损害。三是由市场萧条引发的生存危机。当工人遭遇缺衣少食的生存危机时，他们就不得不通过复工来维系生计<sup>①</sup>，从而削弱工会的斗争力量。总之，工会运动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初级斗争，并非针对劳资关系矛盾根源的斗争<sup>[8]</sup>。尽管如此，相较于工人的个别行动，工会在维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强有力的”<sup>[2]452</sup>。

## 二、工会政治职能：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到新型政治国家建构

工会在为工人阶级争取工资利益的斗争中，“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sup>[2]455</sup>，从而导致工会的斗争方向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这是由于工人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受阻，感到沮丧和失望导致的<sup>[9]</sup>。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问题在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sup>[10]30</sup>，“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sup>[11]333</sup>。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阶级对抗是政治斗争的根源，而政治斗争则是阶级对抗发展的必然。在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中，政治斗争是最高的形式”<sup>[12]</sup>。工会意识到，

<sup>①</sup> 根据韦伯夫妇的记载：1852年1月—4月，工会与工厂主围绕削减加班时间进行斗争；4月，工人根据雇主的条件复工，几乎所有工厂主要求工人签署拒绝加入工会的“证书”，但工人“为贫穷所迫不得不签”。参见：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M]·陈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56。

维护和实现工人阶级工资利益只靠组织罢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斗争矛头从劳资关系领域延伸到资本主义政治形态领域，“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命脉”<sup>[2]454</sup>，这就是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的工会政治职能。

工会的政治职能，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工人阶级抗争行动的具体呈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包含批判与建构两个维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导致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占有，“现代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机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揭示了资本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奥秘，发现剩余价值理论，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及其界限，从理论上论证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4]43</sup>科学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既非主张使社会倒退至封建宗法时代的庄园社会，也并非像傅里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绘制出一幅尽管美好但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乌托邦”，而是旨在通过革命力量构建起这样一个未来社会形态，这个未来社会形态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体制，它将以劳动解放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sup>[2]689</sup>，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4]53</sup>。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将由工人阶级来承担。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在宏观上勘定了工会政治职能的实践空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发现，工会是反抗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一切反抗现存社会形态的积极要素都聚合于工会之中，工会将为工人阶级在未来同资产阶级的决战中取得胜利积蓄能量，“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sup>[2]654</sup>。为达到上述目的，工会首先要向工人阶级揭示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矛盾，阐明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原因，激发和唤醒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阶级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热情。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也会强力抵制工会散布的激进主义政治和文化思想，“不断地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理由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sup>[2]457</sup>，工会对此要提高警惕、坚决斗争。然而，只靠革命理论的传播是远远不够的，科学理论只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才能转化为革命性力量。因此，罢工即成为工会组织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锐利武器。作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早期表征形式，罢工运动一般都是小规模、局部的，向外界释放出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公开斗争的清晰信号。恩格斯指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sup>[2]459</sup>在罢工运动中，工人阶级逐步扩大联合范围，积累政治斗争实践经验，在革命运动的洗礼中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宪章运动是工人罢工普遍化、扩大化的政治结果，它是工人阶级从社会阶级发展为政治阶级的标志。宪章运动剑指资产阶级政权，提出工人阶级应享有普选权的政治要求，“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sup>[2]463</sup>。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也是最强大的工会所在地。此外，工会还要积极争取政治参与的机会，扩大影响和介入国家机构的途径。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议会制度改革和工人普选权的获得，工会在西方国家政治形态中的影响力大为增强。由于工会联络着一大批工人群众，因此在资产阶级政党看来，谁能把工会争取过来，谁就占有了大量的“票源”。普选权的推行为工会进入议会体制开展政治斗争扫清了障碍，“工会的斗争策略逐渐转向体制外抗议和体制内表达两种路径并用的策略”<sup>[13]</sup>，有的工会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有的则自行改组为工人政党参与议会选举。工会在政治空间的积极行动给资产阶级当权者以极大震动，“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sup>[6]545</sup>。

面对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构成的现实性威胁，资产阶级动用手中的武器、资源和力量予以抵制，进一步加深劳资双方的对立和紧张，“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sup>[11]328</sup>。因此，工人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构建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型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sup>[2]497</sup>。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开辟出通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康庄大道。马克思深刻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认为工人阶级对既有国家政权的态度不应当是“照单全收”，而应当是“彻底打碎”，以劳动解放为原则重建国家政权。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专政的首次实践，“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sup>[7]158</sup>。工人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直接管理国家的政治形式，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成为神秘的事情，政府官员也不再属于特权等级，“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sup>[7]198</sup>，管理国家成为工人阶级普遍具备的能力并且融入工人阶级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此意义上，工人阶级专政国家不再是超脱于社会之外的“怪胎”，而是与社会复归合一的新型政治形式<sup>[4]</sup>。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构想中，工人阶级是以直接的方式执掌国家政权的，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代表的工会组织在“工人阶级—工人国家”的政治链条中是“缺席”的。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工会国家化”的设想，即工会是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基本载体。“工会国家化”思想的基本要义包括：第一，工会是实现人民自治的主要方式，是未来共产主义自治联合体的胚胎组织。第二，工会是工业企业的权力机构，代表国家和人民对企业生产、管理和经营作出决策。第三，工会与国家高度融合，伴随工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工人阶级素质能力的提升，人民的“自治”范围将逐渐扩大，工会“管理”国家的领域也逐渐扩展，工会最终将与国家融为一体。工会国家化与国家工业化是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结果是国家消亡和人民自治的实现。第四，工会具有保护、联系、教育人民等功能，人民在工会国家化进程中学习和掌握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本领，人民的政治素养和公共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逐步意识到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人民政治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俄国，让工人直接管理国家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列宁很快放弃了工人通过工会直接管理国家的设想，确立了工人阶级专政的代议制民主形式——苏维埃制度，工人对国家的直接管理随即转变为间接管理，工会则作为先锋队政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结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工会应当是国家政权最亲密的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sup>[15]</sup>。

综上所述，工会政治职能经由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突出强调工会在反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方面的政治行动，到列宁希冀通过加速工会国家化进程，即工人阶级借助工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来实现人民自治，再到“十月革命”后，列宁放弃“工会国家化”的构想，转向通过苏维埃体制来实现人民对国家的间接管理，重新定位工会在先锋队政党和工人阶级国家中的政治方位，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政治职能的认识和定位逐步清晰。据此可归纳出工会政治职能的两项具体内容：一是解构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摆脱资产阶级的经济奴役和政治压迫；二是构建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以劳动解放为原则构建新型政治国家，实现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解放。

### 三、工会救济职能：面向工人阶级内部成员的互助合作

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人阶级陷入绝对贫困的根源，“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

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sup>[2]368</sup>。处于资本主义制度裹挟之下的工人阶级，由于深陷雇佣劳动体制和资本无限扩张的旋涡，其经济状况、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在社会可承受能力最低线“浮动”，工人阶级的劳动不仅未能为其带来富足的物质产品、安逸的生活条件、愉悦的心灵享受，反而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和思想精神世界的普遍萎靡。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将挑动工人阶级政治认知系统的“神经末梢”，波及工人阶级的生活场域和精神世界，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集体行动将产生直接影响。如果经济条件长期停滞不前、每况愈下，必然加剧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程度，导致社会对立紧张，激化阶级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积累形成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了社会整体进步和文明发展。但在这辉煌“业绩”的背后，也生产出一大批徘徊于贫困线一侧的产业工人。在资本增殖逻辑的作用下，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而作为社会财富生产者的工人阶级却日益沦为无产者，“因为工人是把他所创造的价值同时作为与自身相异化的价值创造出来的”<sup>[16]</sup>。即便个别小生产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他们积累占有部分可供自由支配的个人消费基金，但也不同程度地留存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特质<sup>[17]</sup>。工人阶级贫困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具有多维面向和多重意蕴，比如丧失独立劳动能力且永久性依附资本的“绝对贫困”与工人劳动能力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的“相对贫困”，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导致工人陷入“物质贫困”与在工厂制度和机器体系控制下工人片面化发展的“精神贫困”，以及当代人的“现实贫困”通过代际传递所造成的“潜能贫困”等<sup>[18]</sup>。

英国工人阶级贫困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食品危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描述。食品是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在工资收入普遍偏低的情况下，食品支出占据工人阶级消费结构的“半壁江山”。然而，居高不下的物价、圈地运动的蔓延、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及工资收入的不稳定性削弱了工人的食品购买力。食品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基本生存构成严峻威胁，导致一浪高过一浪的“粮食骚动”。1709年、1729年、1739年、1757年、1758年、1773年、1783年、1796年、1801年是英国发生粮食骚动的主要年份<sup>[19]</sup>。汤普森认为，面包或食品暴乱是最常见的暴乱形式，“这种不断发生的暴乱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几乎在城乡各处都可以看到”<sup>[20]</sup>。粮食骚动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具有相似的运动规律，即平均每十年发生一次，周期也越来越短。面对愈演愈烈的经济压力和食品危机，工人阶级除了以组织罢工、砸毁机器、示威游行等方式表达抗议外，只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以解来自经济压力和食品危机的“燃眉之急”：一是向资产阶级国家寻求救济，二是向工人阶级内部寻求援助。初期，工人阶级向政府当局寻求救济，这是因为他们“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sup>[7]528</sup>。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sup>[6]172</sup>，因此工人阶级的悲悯求助最终只会使自己陷入更加悲惨的境地。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新的《济贫法》，该法取消了一切资金和生活资料的救济形式，只保留习艺所作为唯一的救济方式。习艺所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救助设施，其设置理念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工人在习艺所中要想获得政府救济，就必须付出艰辛的体力劳动，工人阶级把习艺所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意指其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与监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绝不可能向工人阶级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救济，习艺所是对政府救济行为的“伪装”，“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实质，充满了谎言和欺骗性”<sup>[21]</sup>，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加激起了工人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sup>[2]492</sup>。因此，工人阶级必须转向本阶级内部寻求支持和援助，工会的救济功能由此展开。

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境况具有高度相似性，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与同情心。工人阶级具有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和道德品质，即

便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工人也愿意从自己十分有限的食品中拿出一部分来援助需要帮助的工人兄弟，正如恩格斯所说，“正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滋味，对他们来说，虽然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中拿出一部分是一种牺牲，但他们还是乐于助人”<sup>[2]480</sup>。救济工人兄弟是工人组织的历史传统，工人、工匠早期形成的自发性团体和组织，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在经济上救济、支援亟待帮助的工人兄弟。比如工人团体中历史最为悠久也最具影响力的秘密组织“共济会”（Freemasonry）<sup>①</sup>，就把弘扬慈善精神、开展慈善活动作为基本职能<sup>[22]</sup>。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工人之间会缔结形成“互助会”或“友好会”，这可以视为工会组织的前身，“几伙工人结合在一起，以他们自己的财力，试图保护自己，以防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生活中某些最不幸的事端，包括失业、疾病、事故、年迈以及其他会断绝工人养家糊口所需的收入的情况。这种互助的趋势不太有效，但是它是一种基本的形式。在近代资本主义开始时，它几乎在所有国家——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中国等——都发展起来，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年代里”<sup>[23]</sup>。济困帮扶是工人组织的历史传统，内嵌于现代工会救济职能及其实现方式之中。

工会救济职能的实现必须以较为稳定和雄厚的财政资金为前提条件，向工人阶级提供资金援助是工会履行救济职能的最基本方式，而这笔资金主要来自工会的公共财政，即工会经费。工会经费是工会组织运行发展和功能实现的物质基础，是工会组织一切活动的开展的重要保障<sup>[24]</sup>。工会经费的支出方向反映工会的履职重心。援助失业和生活困难工人是工会经费支出的主要方向。根据恩格斯的描述，英国失业工人带着一张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每到一地，就会有来自工会组织的成员向他提供资金资助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然而，工会对工人的资金援助并不是无限制的，一旦等待救济的工人数量超出工会经费的承载能力，“联合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sup>[2]453</sup>，工会自身也会陷入资金链短缺的危局。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开源节流，提高工会经费的使用绩效，工会从稳定经费来源和加强经费管理两个方面确保工会经费收支状况保持均衡。在经费来源方面，工人从工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向工会缴费是工会经费的最主要来源，“工人把它们能够从工资中节省出来的钱全部用于建立政治团体和工会组织”<sup>[25]71</sup>，“联合会要求工人负担的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比联合会想争取提高的收入要多”<sup>[25]70</sup>。需要指出的是，工会拒绝来自资本家的资金支持，即使在工会经费状况出现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工会也绝不能吸收来自资本家的捐款和资金帮助，否则工会的工人阶级组织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只有这样，它能够成为保护各个工人不受各个雇主的任意摆布的工会”<sup>[25]159</sup>。在经费管理方面，为了加强工会经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会建立专门的经费管理机构，明确工会经费使用规则，“工会委任一个主席兼秘书，并发给薪金（因为可以设想，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收取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符合联合会的目的”<sup>[2]451</sup>。

工会的救济职能是其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的重要补充。如果说工会的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旨在以工人阶级组织化的形式和集体行动的方式保卫工人工资，是社会抗争逻辑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中的直接呈现，那么工会的救济职能则是遵循合作逻辑，在工人阶级内部中寻求支援和帮助。工会经费关乎工会救济职能的实现程度，开源节流和加强管理是确保工会经费收支平衡、工会职能正常履行的重要保障。

#### 四、工会启蒙职能：从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将国家的概念扩大为整个市民社会，认为“国家 = 政治国家

<sup>①</sup>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2007年中文版）对“共济会”词条的解释，它是指世界上最大的以互助为宗旨的秘密团体。共济会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工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制度。

+ 市民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塑造意识形态霸权以实现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每个国家都是伦理国家，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广大国民的道德文化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从而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适应”<sup>[26]213</sup>。从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包括工会在内的社会力量是统治阶级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手段，“国家的确具有需要人民的认可，但是也要通过政治和工团主义协会‘培养’人民的认可”<sup>[26]214</sup>。面对资产阶级为绥靖工会、同化工会而采取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工会如何保持自身的阶级属性、增强工会对工人阶级思想启蒙的能力，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会是面向工人阶级开展无产阶级政治意识教育的学校，其核心功能就是启蒙工人阶级思想、唤醒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何谓“启蒙”？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为“启蒙”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成熟状态走出。”<sup>[27]</sup>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无法正确使用自己的理智，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则必须由当事人来承担。康德这里所说的“不成熟状态”，在工人运动发展史中来看，就是工人阶级的自在性存在，即自在阶级的状态。恩格斯指出：“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sup>[3]63</sup>自在状态是事物处于原始同一情形下的状态，是事物发展的混沌阶段；一旦事物内部诸要素的差异性逐渐形成并日益显现，那么这些要素之间将构成对立关系，并且充满矛盾与斗争，此时事物的发展则进入自为阶段。

自在与自为是描述事物发展状态及其阶段性特征的概念范畴，马克思用它来解释工人阶级成长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sup>[2]654</sup>只有当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利益的特殊性并且同资产阶级利益对立的时候，即工人阶级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的时候，工人阶级才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换。按照阿隆的定义，“无产阶级意识”由两种经验构成，一种是工人在工厂中获得的直接经验以及同机器和企业领导之间的关系，车间组织、技术熟练程度、领导素质等是决定此种阶级意识的关键变量；另一种是工人对工人阶级整体以及对社会总体的看法，“它主要决定于工会和政党等政治组织，总之是取决于启发工会和政党领导行为的思想体系”<sup>[28]</sup>。无产阶级的意识就是“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sup>[2]542</sup>。工会对工人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在于，启蒙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和觉悟，加速其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

思想启蒙是现代工会的内在性职能。从工人阶级自身的角度看，工人阶级的局限性要求必须有一个超越于工人阶级思想理论水平之上的组织性力量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启蒙。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他们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具有吃苦耐劳、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但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和现代化机器体系的双重约束下，工人阶级在客观上还存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工人阶级内部之间的竞争和分裂削弱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社会力量的统一性，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和理论素养参差不齐，他们“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sup>[2]427</sup>，容易被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微小的经济利益所遮蔽等。因此，工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主观世界和认知能力的改造，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觉悟，避免工人阶级思想道德状况发生滑坡。从现实挑战看，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同化、分裂、争夺工人阶级，向工人阶级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融瓦解工人阶级意识。意识形态控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机制，资产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sup>[2]551</sup>。资产阶级一方面极力构建抽象的民主自由和虚

假的公平正义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向工人阶级推销“工会无用论”,消解工会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有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同工人有直接接触的从事制造业的那一部分人,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sup>[2]457</sup>。这些理由包括:工会的组织成本要大于工人的实际收入;工会将阻碍再生产进行,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和工人破产等<sup>[25]71</sup>。面对来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工会必须坚守和巩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阵地,防止工会的性质变质。从使命任务看,工人阶级要担负实现劳动解放以及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工人阶级的解放蕴含着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sup>[3]164</sup>。在工人运动早期,由于工人阶级思想的不统一以及知识分子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人运动较为分散,影响有限,“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sup>[6]488</sup>。早期自发的工人运动最终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sup>[10]85</sup>。因此,工会、共产党等政治组织必须由外向内对工人阶级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锚定工人运动发展航标,降低工人运动自发性倾向。

政治实践与理论灌输是工会启蒙工人阶级思想的基本方式。政治实践就是工会通过发动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在工人运动实践中历练工人阶级品质、训练工人阶级斗争能力、提高工人阶级阶级觉悟,“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sup>[7]208</sup>。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科学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较低,难以理解深奥的理论,但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工人阶级生存现实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洞察,对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变动具有高度敏感性,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全民族的利益。他们也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能够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sup>[2]427</sup>。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越尖锐,工人运动越发展,工人阶级就越是积累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就越是能够深化对自己特殊利益的认识,“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sup>[2]475</sup>。随着阶级斗争向纵深领域持续推进,工人阶级最终将获得对自身阶级利益的清晰认知,“在其实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知”<sup>[6]540</sup>。

政治经验的获得、斗争方法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中途可能还会遇到波折和失败。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深入工人阶级内部,指导工人运动实践,另一方面运用科学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展开批判,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降低了工人阶级在工运实践中积累形成政治经验和阶级意识的时间成本。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意识,就成为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要利用这个发现推动历史的进步,加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形成”<sup>[29]27</sup>。一是对工人进行“文化扫盲”,提高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水平。工会加强文化阵地和教育设施的建设与投入,“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sup>[2]473</sup>。在这里藏有大量的无产阶级书籍和文献,工人阶级及其子女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和知识教育。不少工会激进分子主张,无知和犯罪之间存在因果关联,工人阶级摆脱贫困、改写人生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教育<sup>[30]</sup>。二是在工人阶级中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工人阶级由数量优势向力量优势转化的关键,“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sup>[7]13-14</sup>。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无产阶级必将解放的历史必然性,“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sup>[6]541</sup>。向工人阶级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工人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

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sup>[4]219</sup>。三是对资产阶级的“反面灌输”<sup>[29]28</sup>保持警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资产阶级反面灌输的三种理论形态，即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一些反面理论是直指工会的，其中以工联主义、政治冷漠主义最为典型。工会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坚决同错误理论作斗争，“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sup>[11]369</sup>。

工会思想启蒙职能旨在唤醒工人阶级意识，使工人阶级从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这是工会从意识形态层面整合工人阶级力量的关键一步。但是，面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霸权，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工会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位置逐渐被工联主义所取代，改良主义、民主主义侵蚀着工会的阶级属性，不少工会纷纷调头转向，放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主张同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妥协、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会的意识形态功能恐怕也只能停留在“思想启蒙”的层面，坚决彻底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改造和科学理论武装的重任，最终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来承担。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职能及其有限性的理论阐释是在领导工人运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展理论批判的过程中推进的。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工会在维护工人工资利益、开展政治动员、提供社会救济、灌输阶级意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注意到，处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的工会很可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绥靖政策”所吞噬，甚至会走向工人阶级的对立面。针对这种可能出现的苗头和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以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的强有力领导来保障工会组织的纯洁性和进步性，这一重要原则是理解当代中国工会政治形态的逻辑起点，也是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sup>[31]</sup>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本质规定性的思想源头。

#### [参考文献]

- [1] 韦伯. 经济与社会：第1卷[M]. 阎克文，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156-157.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谢富胜，陈瑞琳. 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J]. 教学与研究，2016(8)：13-2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曹峰旗，田芝健. 因果追问：马克思恩格斯工会维权理论初探[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10)：58-61.
- [9] 李锦峰. 劳动冲突中的工会：权力来源及其演化路径[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2)：62-71.
- [10]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 王沪宁. 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67.
- [13] 高奇琦. 国外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团体的互动研究——一种政党结盟与解盟理论的分析[J]. 社会主义研究，2012(3)：92-96.
- [14] 汪仕凯. 从现代国家到社会共和国：卡尔·马克思的国家理论[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8(5)：26-34.
- [15] 列宁.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2.
-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8.
- [17] 西蒙. 劳动、社会与文化[M]. 周国文，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74.
- [18] 姜英华. 贫困、贫困积累与贫困克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条隐性线索[J]. 社会主义研究，2019(2)：16-24.
- [19] 舒小昀. 粮食骚动、道德经济与谷物法的废除[J]. 史学月刊，2012(4)：99-105.

- [20] 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上 [M]. 钱乘旦, 杨豫, 潘兴明,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56.
- [21] 汪连杰. 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中国化研究 [J]. 经济学家, 2018(6): 21-28.
- [22] 何新. 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 [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19.
- [23] 福斯特. 世界工会运动史纲 [M]. 李华, 赵松, 史仁,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26.
- [24] 蒋永清. 马克思主义工会经费观 [J]. 中国工会财会, 2000(3): 5-7.
- [2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 [M].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0.
- [26] 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曹雷雨, 姜丽, 张跣, 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27] 南星. 论康德启蒙观的发展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9(3): 82-91.
- [28] 阿隆.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M]. 周以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65.
- [29] 余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灌输”的论述及其启示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4(1).
- [30] 郭家宏. 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教育问题探析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6): 152-157.
- [3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4.

## The Theoretical Exposition by Marx and Engels on the Func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rade Union

LIU Jia

(*School of Marxism,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The view on the functions of the trade un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Marxist trade union theory and is a crucial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form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modern trade unions organiz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workers' movement and conducting theoretical critiques on capit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Marx and Engels provided a theoretical exposition on the func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rade union. They recognized the significant roles of trade unions in safeguarding workers' wage interests, promoting political mobilization, providing social relief, and instilling class consciousness. However, they also noted that under the capitalist wage labor system, the trade union could be potentially absorbed by capitalist ideology and the bourgeois "appeasement policy", which might lead to a position antagonistic to the working class. To address these emerging tendencies, Marx and Engels emphasized that trade unions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vanguard party.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n vanguard party is essential to ensure the purity and progressiveness of the trade union organizations. This important principle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an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trade unions' necessity to uphol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 functions of the trade union; interest safeguarding; political mobilization; social relief;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张晋巧]